



坚定文化自信要回答好三个问题

“自己是谁、是从哪里来的、要到哪里去”，这样的自问就是站在时代制高点对一个民族过去、现在和未来深刻的哲思，在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程中，只有不断地追问、清醒地回答好这三个问题，才能一路走好。

□ 康 伟

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如何坚定文化自信？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必须知道自己是谁，是从哪里来的，要到哪里去，想明白了、想对了，就要坚定不移朝着目标前进。”坚定文化自信要做到认清本来、不忘由来、面向未来，也就是要回答好三个问题：自己是谁、是从哪里来的、要到哪里去。

自己是谁

中国是一个什么样的国家？中华民族是一个什么样的民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特”在哪里？坚定文化自信首先要明白“自己是谁”，搞清楚我们有什么没有什么，干什么不干什么，有什么特点又有什么优势。对当今中国来说，就是要清醒地认识我们究竟举什么旗、走什么路、坚持什么样的制度这几个带有根本性的问题。

我们要建设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而不是其他什么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来之不易，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党全国人民历经千辛万苦、付出各种代价、接力探索取得的。我们必须始终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既不能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能走改旗易帜的邪路。我们要坚持和完善党的领导，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我们要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这是具有我们自己特色和优势、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我们吸收借鉴人类文明的一切优秀成果，但绝不接受任何强加于我们的不适合中国国情的制度和模式，也不能突然搬来一座制度

的“飞来峰”。我们不认同所谓的“普世价值”，我们坚守符合中华文化和中国国情的核心价值观，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中国就是中国，中国不是他国。“鞋子合不合脚，自己穿了才知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不是好，要看事实，要看中国人民的判断，而不是看那些戴着有色眼镜的人的主观臆断。如今，“中国特色”“中国道路”已经越来越具有影响力、说服力，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完全有信心为人类对更好社会制度的探索提供中国方案。每一个中国人都应该有这个自信和自觉，增强做中国人的骨气和底气。我们要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同时，不断丰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特色、理论特色、民族特色、时代特色。

是从哪里来的

“一切向前走，都不能忘记走过的路；走得再远、走到再光辉的未来，也不能忘记走过的过去，不能忘记为什么出发”。一个人、一个家族要寻根问祖，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更不能数典忘祖。坚定文化自信要明白我们“是从哪里来的”，我们的血脉和根基在哪里，遗传了什么样的历史基因，秉承什么样的历史积淀。

我们是从中华民族 5000 多年悠久文明的传承中走出来的。中华民族在几千年历史中创造和延续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根本和魂。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已经成为中华民族的基因，渗透于民族血脉，植根于民族内心。知道“从哪里来”，就要始终牢记中华文化积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包含着中华民族最根本的精神基因，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是中华民

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丰厚滋养。

我们是从近代以来 170 多年中华民族发展历程的深刻总结中走出来的。知道“从哪里来”，就要始终牢记近代以来中华民族备受欺凌，中国人民奋起抗争救亡图存，戊戌变法、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一次次尝试一次次失败，只有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人民，打败日本帝国主义，推翻国民党反动统治，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实现了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彻底结束了旧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

我们是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60 多年的持续探索和改革开放近 40 年的伟大实践中走出来的。知道“从哪里来”，就要始终牢记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人民完成社会主义革命，确立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消灭一切剥削制度，完成了中华民族有史以来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就要始终牢记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人民进行改革开放新的伟大革命，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确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实现了中国人民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强起来的伟大飞跃。就要始终牢记改革开放前和改革开放后本质上都是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探索，不能用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也不能用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

“一个民族的历史是一个民族安身立命的基础”。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一个没有历史记忆的民族是没有前途的，忘记历史就意味着背叛，应坚决反对任何形式的历史虚无主义。

要到哪里去

有理想有目标有追求才有无穷动力，才会明方向知去向辨航向，知道“要到哪里去”，才不会“走到哪里算哪里”。坚定文化自信要明白我们究竟“要到哪里去”，我们的最高理想是什么，共同理想又是什么，要实现什么样的奋斗目标。

我们党在不同历史时期，总是根据人民意愿和事业发展需要，提出富有感召力的奋斗目标，团结带领人民为之奋斗。中

国共产党自成立的第一天起，就明确了我们“要到哪里去”，这就是实现共产主义，中国共产党就是要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一步步迈向共产主义光辉前景。理想因其远大而为理想，信念因其执着而为信念。坚定文化自信就要坚定共产主义远大理想，不断向着这个最高理想和最终目标而矢志不移地努力奋斗。

明确了最终“要到哪里去”，还要进一步明确近期“要到哪里去”，也就是要根据基本国情明确现阶段和今后一个时期要达到而且也能够达到的目标。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是中国最大的国情。我们现阶段的奋斗目标和行动纲领就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这也是我国各族人民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共同理想。党的十八大提出了“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这就是：到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到新中国成立 100 年基本实现现代化，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习近平总书记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这一伟大目标的提出，成为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人民最伟大的梦想，极大地鼓舞着全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成为中华民族团结奋斗的最大公约数，也将激励着每一个人在为中国梦的奋斗中实现自己的梦想。现在，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有信心、有能力实现这个目标，我们要自觉做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的坚定信仰者、忠实实践者。

恩格斯说：“一个民族想要站在科学的最高峰，就一刻也不能没有理论思维。”“自己是谁、是从哪里来的、要到哪里去”就是站在时代制高点对一个民族过去、现在和未来深刻的哲思。在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程中，只有不断地追思、清醒地回答好这三个问题，才能一路走好。



文化视野

大运河文化对城市及陶艺发展的影响

□ 刘士林

大运河文化的基本内涵

德国哲学家斯宾格勒曾说：“世界历史，即是城市的历史。”大运河的历史就是一部运河城市发展史。作为独特的河流文明谱系，运河文明的精华集中于两岸的城市或中心城区，又以城市为中心枢纽而延伸到古代中国文明肌体的末梢与细部。沿运河水陆网络在广阔空间上扩展开去的城市与乡村，在社会结构、生活习俗、道德信仰以及人的气质与性格上，无不打上了深深的“运河”烙印。如天津城东门和城北门在明清时期是天津最繁华的所在，原因无他，只是因为这两个城门正对着运河，占到了经济地理上的“区位优势”。又如北京齐化门外东岳庙一带，历来是京城人士辐辏之处，也是因为沾了运河漕运的光儿，每年三月才形成了“道涂买卖，诸般花果、饼食、酒饭、香纸填塞街道”的城市景观。

依托于独特的地理、经济与社会条件，大运河不仅只是一条联系南北、沟通中外的桥梁，同时也建构了具有独特文化功能的城市形态或类型。从文化类型上看，与古代主流性质的农耕文化不同，运河城市本质上是一种商埠型文化；从城市功能上看，运河城市超越了“政治型”与“经济型”的二元对立模式，也是两者在中国古代融合得最好的城市发展模式；从生活方式上看，与安土重迁的农业社会不同，运河城市最可注重的是其文化的开放性与生活方式的多元化。凡此种种，使运河城市既对中国古代社会向更高层次的发展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又在岁月沧桑中逐渐演化成为一种弥足珍贵的文化资源与文明遗产，是研究中国城市社会与文化的一个弥足重要的本土性对象。

当今世界是城市的世界，城市化也是

我国发展最重要的动力机制。因此，大运河沿岸城市和文化的复兴与重建，必须要有置于城市背景和框架下的自觉意识，从而找到自身的立足点和战略方向。

大运河沿线城市的兴与衰

在历史上，大运河与沿岸城市是一体同胞、唇齿相依的。一方面，很多城市都是由于运河开通而迅速完成了自身的“城市化”，从默默无闻的农村或普通市镇发展为具有相当规模或中心意义的大城市。如山东临清，就是由于大运河的开通，把它从一个叫“鳌头矶”的水洲改变为一个重要的运输与物流中心，一跃发展为“绅士商民近百万口”的明清中心城市，也是当时华北最大的棉布、绸缎和粮食等商品集散和贸易中心。另一方面，许多城市的命运与大运河的兴衰也是紧密联系在一起。以扬州为例，在京杭大运河走向繁盛的唐代，扬州是一座举世闻名的大都市。真正使扬州命运发生逆转的，是另一种现代交通系统取代了大运河。如现代作家郁达夫所说：“铁路开后，扬州就一落千丈，萧条到了极点。”

从唐代开始，江南城市的商业文化逐渐发展成熟，而唐代运河与京杭大运河在其中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和很多江南市镇的经济商业繁荣、城市规模扩张、城市地位提升一样，宜兴同样占了以大运河为主干道的江南水系交通网的“大便宜”。

宜兴原名阳羨，地沃水甘，泉水和土质均属上乘，茶叶和陶土品质尤好，在历史上逐渐形成了以茶叶生产贸易和陶艺手工业为代表的产业和商业特色。由于产业和事业都需要便利的物流系统，所以真正使宜兴成为江南乃至全国有名的产茶和陶艺名城，除了宜兴境内河流密布、纵横交叉，灌溉、运输方便，最根本的原因还是由于它与大运河距离较近，联通到一个更大的交流网络中，使各种物产和商品容易

流通出去以及成本较低。

从城市化发展看，宜兴的城市地位一直不够稳定，其表现在县和府反复变化的过程之中。实际上也是因为其和无锡、苏州、常州相比，宜兴与大运河的距离仍“有点远”，因此在江南一带的区域竞争力明显不够。从历史上看，宜兴陶瓷文化兴盛的时期往往也是社会安定、商业繁荣以及运河商路通畅的时期。以宜兴陶瓷中的青瓷和紫砂为例，唐代是大运河文化的黄金时期，也是宜兴成为南方著名青瓷窑产地的时期。又如明代的宜兴以紫砂器闻名于世，有“价埒黄金”“人间珠玉安足取，岂如阳羡土一丸”之说，这也与明代运河漕运的发展密切相关。

除了物产和商品，宜兴的文化影响力也主要是借助大运河而传播的。如天津宜兴埠的来历就与宜兴有关。明朝初期，有大量的宜兴船工沿大运河运送建造北京城的材料，长期在天津宜兴埠歇脚，也有一部分人定居下来，同时把宜兴特有的生活方式、民俗风情等传播到中国北方，形成了后来的宜兴埠。和人口迁移相伴的“文化漂移”现象，在运河沿岸的很多城市相当普遍，这也说明了宜兴城市文化传播和大运河有着密切的关系。

大运河文化对陶瓷工艺的影响

大运河的开通与历代的修整，对古代北方先进生产技术与文化的向南传播，带动运河沿岸手工艺的发展，具有重要的交通走廊意义。何荣昌先生说：“自从隋炀帝开江南河之后，不但改善了江南水陆交通的面貌，更重要的是使江南地区与中原联系在了一起，从此，江南地区与全国各地发生广泛的经济文化联系，对江南地区以及东南沿海社会经济的发展，产生着深远的影响。”除了农业生产技术，民间手工艺的传播与交流也受惠于大运河提供的便捷交通条件。如运河沿岸的农民画、剪纸、

泥玩、布玩、面人、风筝、彩灯、玩具、糖人、木雕、石刻、刺绣、木版年画、草编、柳编、刺绣织锦等，都被打上了南北文化交流的烙印。同时，手工艺作为服务业和文化产业，必然要依托经济繁荣、人口众多、消费水平高的城市。这是江南城市中很多手工艺作坊逐水而建、因水而兴，甚至像苏州和杭州那样发展成全国手工业中心的根源。同时，也有一些城市，其原本发达的手工艺，因为运河的改道、淤塞等而衰退和衰亡。

大运河对宜兴的陶瓷文化和技艺同样有重要影响。和其他手工艺的发展一样，要实现宜兴陶瓷的繁荣发展，一方面，需要更多的生产主体通过生产性竞争推进技术和技艺的进步；另一方面，也需要有更多的消费者通过市场性淘汰机制影响生产过程本身。但无论是扩大再生产，还是要获得更大的市场，都需要解决产品的流通渠道或流通成本问题，而中国古代的大运河就是在这个意义上为宜兴陶艺的高水平和可持续发展创造了良好的社会条件。这主要表现在两方面：一是由于更多的人的交流和往来，使宜兴陶艺在文化观念、美学观念、工艺技术等方面不断开阔眼光，取长补短；二是由于更广阔的区域被联系起来，使宜兴陶艺在适应不同市场需求的过程中不断明确需求，自我更新。

如今，宜兴陶瓷名满天下，但这座与运河渊源颇深的城市，对自身与运河的密切关系还需进一步重视和系统化挖掘。如宜兴城市中有“运河路”地名，说明宜兴人和大运河在历史上有密切联系。特别是在大运河已成为世界遗产的背景下，如何充分利用宜兴的运河文化资源，借助世界遗产的平台推进城市建设和陶艺发展，也都是值得深入研究并进行战略规划的。



文化遗产

警惕新媒体『隐性引导』走入歧途

□ 王志博

如今新媒体已不再是一个新名词，传统媒体也多半进行或者完成了新老媒体融合，新媒体在传播形式上完全不同于传统媒体，是一种“柔性传播”，而“柔性传播”中最为突出的特点是“隐性引导”。这种看似中立却带有一定立场的引导方式，如果出现立场、价值偏差，往往会对社会以及受众产生较大的危害。

由于新媒体在传播样式与形式上采用了大量的图片、视频、动画、图解等第一视角元素来阐述一件事情或者道理，使得内容展现更直接、更容易理解与接受，因此也更容易让人相信。但是新媒体的传播方式与方法体现在一些自媒体传播过程中发生了异变，这种传播不以真实性为目的，只讲究个性与“吸睛”，关注的往往是社会矛盾、娱乐八卦等极具炒作性的话题，报道的方式也区别于传统媒体。自媒体往往使用极具说服力的现场视频、图片、直播等视觉元素来呈现所想表达的意见。这些元素看似中立，但却未必是事实，所发布出来的视频与图片带有一定的倾向性，这种倾向性就是一种“隐性引导”，让受众不知不觉地向内容发布方所想表达的意愿上偏离，这种偏离是在不自觉的情况下自发自愿的产生，比一般性引导更隐蔽，也更容易让人接受，引导性比传统方式强大很多。

自媒体传播过程更多讲求的是“贴近性”和“接地感”。拉近与受众之间的距离，让人感觉身临其境，不自觉地把自己带入现场，跟着发布者的思想不断地更新跳跃，引导自己带入个人的想法与感受，又将这些自身的想法与感受加入到消息源中，使消息源不断地壮大与变化，同时自己的出现也间接地佐证了消息的可靠。这种“隐性引导”如果带有一定的负面企图，危害往往是很大的。

自媒体的这种“隐性引导”除了在内容上的表现，还存在于传播的渠道与载体上。传统媒体比较单一，类似于线性传播，点对面的方式，我说什么你听什么，不管你是愿意听还是不愿意听，我都在你说。这种方式有一定的优势，那就是消息可编、可控、目的明确、目标唯一，其权威性要比自媒体强很多。而自媒体的传播渠道不同，是交叉式多维度自发性互动传播，渠道就是每个人的眼睛、耳朵和思维，受众既是消息阅读者，也是消息传播者，还有可能是消息制造者，这种传播渠道极具个性化，并且符合受众的思维方式，就跟闲聊一样，很轻松就让人接受。而在载体方面就更加突出，传统媒体无非是电视、电台、广告牌，报纸、杂志、宣传栏，无论哪种，都不是我们生活中所必不可缺的产品。自媒体则不然，它的载体深入到了每一个人的生活之中，除了智能手机，现在的智能穿戴设备也发展迅速，眼镜、手表，未来你的外套、鞋子，甚至皮肤都可以传输数据，显示信息，显然这是我们无法缺少的东西，信息出现在这些生活必需品甚至身体本身之中，其传播的效率会呈现“病毒般”指数性倍增。一旦出现带有倾向性的内容产生，往往一石激起千层浪，消息会在传播过程中“秒变”。然后再加上秒变过程不断有新的消息产生与加入，这种不受控的实时、互动、个性的传播使得一件普通网络事件经过这种报道后，很容易变成网络群体性事件，再加上部分别有用心之人线上线下互动、配合，极易引导舆论走向，最后受伤害的还是社会与受众。

面对上述情形，传统媒体要多发挥自己的特长，利用自己的权威性在各自平台上第一时间响应。响应方式要注意，在没有确凿证据之前只讲事实，不可贸然发布辟谣消息，以免造成二次传播。而二次传播的引导性会更加猛烈，事态会朝极反方向发展。只有在证据充分的前提下，利用新媒体传播的优势，以同样的方法，利用证据与事实还原事件真相，则谣言不攻自破。

总之，“隐性引导”是把双刃剑，只有认清这种“隐性引导”的危害，才可以对症下药，用同样的引导方式将受众引导回正常的轨道。



随笔